

体育文化：繁荣发展 天地广阔

孙大光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 北京 100061)

摘要: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我国体育文化工作繁荣发展, 体育文化工作由初期较单纯的体育史学研究, 逐步扩展为对体育管理、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经济等各项体育事业发展的全面关注与研究; 密切配合国家与体育事业发展的体育文博展览、立足于国家体育基础资料建设的体育档案工作和《中国体育年鉴》编辑出版工作、着力促进学术交流的体育文化学术工作和《体育文化导刊》的编辑出版工作、积极从事中国体育文化走出去的体育文化宣教工作等取得显著成绩, 影响不断扩大。体育文化天地广阔, 未来的体育文化工作应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为指导, 努力打造高素质的体育文化队伍等, 为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关键词: 体育管理; 体育文化; 体育史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 伴随着新中国的体育事业的进步, 体育文化工作在体育资料和文物的收集、整理、研究, 中国体育博物馆的建设、发展, 体育档案馆的建立和档案收藏, 大型体育专著的编撰、体育文史期刊和中国体育年鉴的编辑出版, 体育史学研究, 以及体育集邮活动的开展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繁荣发展, 取得了许多优秀的成果。

一、“文革”之后的艰难起步

中国体育文化发展工作是从体育文史工作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结束不久,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就根据文化发展的需要和对外交流的需要, 积极组织开展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编撰。1979 年底, 国家体委应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要求, 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 最终于 1982 年完成了 120 万字和 1222 幅图片的书稿, 并于 1983 年 1 月正式出版。当时, 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编写组确定了全国 300 多位专家作为撰稿人。通过编写大百科全书, 编写组收集到大量的体育资料, 并联系了各个方面的体育专家和学者。就在编写组编写《大百科全书·体育》卷时, 一项更为宏大而长远的计划也已在酝酿之中, 那就是专门成立一个体育文史机构, 长期从事体育文史资料的整理、研究和出版工作。

1982 年 11 月 23 日, 国家体委决定在宣传司内设临时机构——“文史办公室”的基础上, 正式成立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 整理、收集体育史料、文物, 组织编审体育史书, 研究历史经验, 传播体育知识, 筹建体育博物馆, 指导各地体育文史工作, 为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在此之前, 1979 年 9 月 28 日,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作出了《关于搜集和整理体育文史资料的决定》, 并于 9 月 30 日成立了“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体育文史资料编审委员会”。主任是

何启君, 副主任是吴重远等 10 人, 委员 132 人。

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成立后, 迅速开展了一系列体育文史工作。这里仅列举 1983 年开展的几项工作便可见一斑:

1983 年 1 月创办了《体育文史》杂志。20 多年来, 它为推动体育文史研究和体育文化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如今它已更名为《体育文化导刊》, 成为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核心期刊。

1 月 10 日, 召开了国家体委第二次搜集整理建国后体育史书座谈会, 国家体委顾问荣高棠、副主任徐才到会讲话。

1 月 20 日, 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召开了撰稿人会议, 吴重远主持, 何启君等出席。

3 月, 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制定了 5 条主要工作职责, 并获批准。这 5 条职责是: 1. 征集、整理、研究、保管体育历史资料; 2. 征集、整理、研究、展出体育文物, 建立并管理体育博物馆; 3. 编审体育史书、史刊; 4. 组织编写体育百科全书等大型综合性体育书籍; 5. 指导各地体育文史工作。

3 月 2 日, 国家体委发出普查体育文物的通知。

3 月初, 根据中央的部署, 国家体委党组决定成立《当代中国体育》编写组。主编荣高棠, 副主编黄中、何启君、张彩珍, 委员吴重远、毕世明、谷丙夫。

4 月, 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整理建国后体育史书工作情况交流会。荣高棠出席。

6 月初, 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在长沙召开了中南地区体育文史工作片会, 讨论了 1982 年全国体育文史工作会议以来的成绩和问题, 以及文史机构、编制和资料的搜集、整理、使用等问题。

6 月 24~29 日, 国家体委在郑州召开了全国体育文物工作会议。国家体委副主任徐才到会作了总结讲话。

7 月, 国家体委正式下发了“关于《全国体育文物工

作会议情况报告》的通知”。

同月，国家体委颁布了《体育文物工作暂行办法》(试行)。

10月，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在安徽歙县召开了华东地区体育文史工作片会，讨论了体育文史工作的目的、意义，建立机构、配备和培训队伍、制定工作计划等问题。

12月15日，国家体委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大型体育展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为展览剪了彩，宋任穷、江华、程子华、周谷城、荣毅仁、吕正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展览由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和武汉展览馆承办。

经过1979年以来编写《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实践和思想上的酝酿、准备，加上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机构的建立，以及1983年一年在全国上下开展的一系列具体工作，国家体委整个体育文史工作的发展思路和目标逐渐明晰，这为后来近十年体育文史工作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体育史料积累的迅速增加和一大批高校体育史学者的积极参与，体育史学研究成了20世纪80年代我国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引人注目的一个活跃领域。与此同时，各方面对成立一个全国性的体育史学研究团体的呼声日渐高涨。1984年6月22日至7月5日，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在四川乐山先后举办了全国体育文史工作干部学习会和编辑工作经验交流会，请专家讲授了文史知识，交流了编辑工作经验。7月7日至8日，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体育史学会，通过了《中国体育史学会章程》，选举了学会领导机构的组成人员——何启君为理事长，吴重远等6人为副理事长。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顾问荣高棠、体总主席钟师统向成立大会发了贺电，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体育史学会的成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体育史学工作者，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后期我国体育史学研究的发展。

二、从小到大的体育史学研究——机构、队伍、成果

(一) 新中国成立后的体育史学概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体育史学工作一如既往地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1952年全国体总和中央体委成立后不久，成立了体育运动技术委员会(主任是王任山和董守义)，主要任务是研究和编纂体育史，并成立了以著名武术史专家唐豪为首的班子，进行了大量的体育史料的收集、整理、考订工作，先后编辑出版了9辑《中国体育史参考资料》。1957年，该会还专门召开全国会议，制订研究体育史的专门规划，并计划5年内编出《中国体育史》。唐豪搜集整理的图书、资料和文物以及研究成果，是后来体育史研究的宝贵财富，为体育史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初，部分体育学院的体育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开始上马。如成都体育学院成立了以董时恒、孙仲达、李季芳三位教授为主要力量的“体育史研究室”(后改称体育史研究所)，进行了较为系统的中外体育史研究，成

为全国体育史研究的“领头羊”。与此同时，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以谷世权为代表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从1961年起从事体育史研究，对原始社会体育、国民党统治时期体育、中国近现代体育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初步探究。1964年，还在北京体育学院首次开设了“体育史专题讲座”。

“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导致了体育史研究工作的中断。1972年，体育战线在周总理关心下率先恢复生机，成都和北京两所体育学院的体育史研究工作也从1972年左右开始恢复。但是，这个时期的体育史学研究留有明显的“文化大革命”的印记。

(二)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蓬勃发展的体育史学研究和人才辈出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科学、教育的真正春天，“盛世编史”成为人们的共识，全国上下“编史修志”的热潮为中国体育史研究提供了极好的氛围和发展契机。这一时期，体育史的教学研究可以说出现了“百花齐放”、“一片繁荣”的景象。

首先，为了加强对全国体育文史工作的领导和统筹规划，1982年5月，在江苏无锡市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体育文史工作会议。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区、市体委也循此陆续成立了文史委员会或文史办公室，指定专人或有人兼管体育文史工作。这期间，国家体委“文史办”还根据编写《大百科全书·体育》卷的需要，编译了多部日本、匈牙利、美国等体育史学者的专著，并编辑了十多辑《体育史料》。各省、区、市体委文史办成立后，也纷纷出版各地的体育文史期刊，大大丰富了全国的体育文史资料。这既有利于加强对全国体育文史工作的领导，又为全国体育史研究的成果提供了发表的园地。同时，各级体委系统的专、兼职干部构成了中国体育史研究队伍的又一支骨干力量。

其次，为了进一步推动体育史学研究，1984年7月7日，中国体育史学会在四川乐山正式成立。据统计，从史学会成立到1989年发展了600余名会员。在人员和物质都有保证的基础上，学会最突出的工作是每年根据需要设立主题，分别举行专题或全国性的体育史学术论文报告会，极大地调动了会员学术研究的积极性，推动了体育史各领域的研究快速发展。这些学术会议还多把学术成果印成《论文集》留作重要史料。这一时期除《体育文史》外，《成都体育学院学报》也成了侧重体育文史研究的刊物。除国家体委文史委外，成都体院体育史研究所和浙江杭州大学体育系，以及北京体育学院图书馆和南京第二档案馆等为研究中国近代体育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出版了一大批体育史的专著和译著，成为体育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见下表)。

从以上材料看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体育史研究成果有如繁花似锦、繁星满天。

第四，中国体育史学术活动开始走出国门、与国际接轨。

1985年10月，中国体育史学会副理事长毕世明被国

国家体委有关部门编写的体育史书目

编号	书名	主编	出版年月	出版社
1	《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体育史部分	李季芳	1982.12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	《当代中国体育》	荣高棠	1984.12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3	《中国近代体育史》	何启君 胡晓风	1989.5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4	《中国古代体育史》	毕世明	1990.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5	《中华体育文化五千年》(图册)(中国奥委会编)	刘吉	1996.6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6	《新中国体育史优秀论文集》	刘吉	1997.4	奥林匹克出版社
7	《二十五史体育史料汇编》	翁世勋	1997.10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综合卷)	伍绍祖	1999.9	中国书籍出版社

体育史学研究者出版的学术专著

编号	书名	主笔	出版年月	出版社
1	中华体育五千年	林思桐	1984.8	西安体院学报编辑部
2	中国古代体育史简编	李季芳等	1984.8	人民体育出版社
3	体育运动全史(匈)拉斯洛·孔著	颜绍泸译	1985.10月完稿	体育史学会内部出版
4	中国古代体育思想史纲要	郑振坤	1989.4	人民体育出版社
5	中国体育之谜	李 宁	1989.11	同上
6	体育运动史	颜绍泸 周西宽	1990.9	同上
7	古代体育寻踪	陈昌怡 谭 华	1990.9	同上
8	中国体育思想史	乔克勤 关文明	1993.6	甘肃民族出版社
9	中国近代学校体育史	苏竟存	1994.3	人民教育出版社
10	中国近代体育史话	崔乐泉	1998	中华书局
11	新民主主义体育史	苏肖晴	1999.7	福建教育出版社
12	体育史话	崔乐泉	1999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际体育史协会主席团会议选为主席团成员。这是中国体育史学术组织与国际体育史学术组织联系的开始。

1985年8月,国际体育史协会(HISPA)副主席、联邦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史教研室主任、著名世界体育史专家曼弗瑞德·莱默尔教授应邀到北京,为80多位参加由北京体育学院和中国体育史学会共同举办的学习班的学者讲课。

1986年9月,国际体育史协会在日本神户举办学术讨论会并召开工作会议。中国的毕世明与会并报告论文《先秦的中国体育》。这是我国第一次派人参加世界性的体育史学术会议报告论文。

1987年8月,中国体育史学会在西安举办的“中国古代体育专题研讨会”上,日本学者寒川恒夫、笹岛恒辅、铃木圆藏应邀来华参加学术活动,为日本学者参加中国体育史学术会议之始。1988年6月,成都体院颜绍泸应邀参加了在南斯拉夫举办的国际体育史学术研讨会。

1994年,中国体育史学会正式加入东北亚体育史学会,并保持不断的学术交往活动。1995年后,中国体育史学会与东北亚体育史学会一直保持两年一届的学术会议。

国际体育史学术交流使中国学者了解了世界体育史研究的信息和水平,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体育史研究水平的提高。

第五,各体育院校逐步开设了体育史课程,并编辑了相应的教材。1982年,北京体院首先在体育系本科生中开设了中国体育史必修课。谷世权和杨文清编写了的《中国体育史》于1981年3月内部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版的第一本较完整的中国体育史著作。北京体院还从1983年起正式成立了“体育史教研室”,开设了中国体育史、世界体育史、竞技运动史,武术史、体育管理史、奥林匹克运动等6门课程。此后,沈阳、武汉、天津、上海、成都和西安等体院也陆续指定专职教师,开设了体育史课程。开设体育史课程,编写体育史教材,不仅推动了体育史学研究,也为体育史学研究培养了大批后备人才。

(三)近十年体育史学研究:开阔视野,从文化的视角探索体育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特别是国内外体育学术交流活动的日益频繁,21世纪中国体育史学者的视野也发生了巨大改变。体育史学已不再仅仅“叙述历史”,而是着眼于回答历史现象和历史事件中的种种“为什么”以及它们对历史、社会和体育活动本身发展的影响。学者们还以“大文化”的眼光探讨体育,体育休闲、体育经济、体育教育、体育科技、奥林匹克运动、中西体育比较、中国传统体育、体育传播、体育服装、体育音乐、体育美术、体育器材、体育政策、体育法律法规等等的历史演变,以

及各项目发展的演变,与外国体育文化的比较等,均纳入了体育史研究者的视野,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一是学科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相继出现了《20世纪中国·体育卫生卷》、《中国唐宋体育史》这样的断代体育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体育史》、《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史》、《文物与体育》、《中国体育经济史》、《中国体育思想史》、《奥林匹克运动通史》、《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术史》、《敦煌古代体育文化》这样的专史,还有《中国体育文化五千年》、《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集》等图文并茂的大型体育历史著作。这些成果的出现,标志着体育学术界已摆脱了相对粗放式研究体育史的方法,逐渐向精深的方向发展。

二是学科研究方法有所进步,主要体现在学科理论基础逐步向深广发展。历史学、考古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哲学、法学、统计学等学科的理论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意识地用于收集资料、分析现象、说明规律。有学者在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发展历史的研究中,就涉猎到多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如《中国体育经济史》从体育经济现象入手进行了归纳研究,《体育人类学》延续了人类学研究的模式,结合体育文化本身的特点,注重实证性的分析研究,将其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入到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去。

三是学科的现实性逐步增强,突破了以往选题的书斋式和学院式研究方式,摆脱了以古论今的习惯治史思路,逐步树立了以今论古的治史思路。特别是北京申办奥运会成功以来,围绕为奥运会服务的相关著述相继出版,对奥林匹克相关问题和现象的历史学阐释越来越多,对体育产业的现实问题的解释也越来越借助回溯历史等方法。

四是随着地方体育史志的逐步完成和单项运动史丛书的陆续出版,对中国体育整体格局的研究越来越便于展开,中国体育各类史书的编撰具备了基础条件。

近十年来,中国体育史学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得益于以下几点:

一是以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为指导和依托,保持了良好的学术活动和工作会议周期,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和探讨,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这是体育史学术研究的保证。

二是以《体育文化导刊》为平台,使体育学者有用武之地。

三是有东北亚和世界体育史学会的定期活动,能够获得良好国际交流的外部条件,有助于推动国内学者走向国际体育史学界。

四是历史具有统摄一切的特点。体育史学术研究能够将触角延伸到所有体育领域,尤其是整个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为体育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近年来,许多活跃在体育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很多学者就是体育史专业出身。

五是目前整个体育事业的发展对体育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有迫切需求,为体育史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提出为追求精神和文化境界

的国人提供了体验和研习体育文化的动力。

六是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和举办加快了国内体育文化的民族化定位和全球化传播,体育史研究者获取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整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和推出特色民族文化对外推广等方面,体育史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从无到有的中国体育博物馆

体育博物馆作为一个兼具文物收藏、科学研究和社会教育三种基本属性的文化教育场所,是展现体育事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窗口。它的建立与发展不仅对体育文化的积累与弘扬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提升国民整体素质、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的体育文博工作在国务院各部委中开展得较早,进展较快,成果也是较为丰富的。

(一) 中国体育博物馆的建立

体育博物馆是体育文化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化大革命以前,国家体委就十分重视搜集和保存体育文物。“文革”期间,为免遭损害,一些怀着强烈责任心的体育工作者将收集到的体育文物封藏于北京体育馆的顶楼上,将新中国成立初期搜集的一批珍贵文物保存了下来。

1981年,国家体委在《体育事业“六五”计划和十年设想》的报告中确定“七五”期间筹建中国体育博物馆。1982年,全国体育文史工作会议提出各地要收集体育文物的要求。同年7月,国家体委发出了《关于清理建国以来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所获奖杯等物品的通知》。1983年,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李梦华在全国总工会上宣布:“开始筹建体育博物馆”,并于5月召开全国体育文物工作会议,布置文物普查工作。10月,国家体委决定“将体育博物馆建设列入1990年亚运会体育中心建设计划”之中。

1988年4月,国家体委正式下达《关于中国体育博物馆工程初步设计概算的批复》,其建设资金1200万由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先生捐赠,同年8月破土动工。1989年7月,国家体委办公会审议并通过了《第11届亚运会中国体育展览暨中国体育博物馆基本陈列方案》;同年11月,经国家人事部批准,中国体育博物馆正式成立。中国体育博物馆成立时的内设机构,包括体育档案馆和中国体育集邮协会。1990年8月,中国体育博物馆工程竣工。馆舍建设的同时,布展工作也在加紧准备。国家体委经过几次全国范围内的调拨文物,又组织了20多次展览,到1989年底共收集到奖杯200多座、文物3000多件,为中国体育博物馆新馆陈列打下基础。1990年9月22日,第11届亚运会开幕之日,中国体育博物馆亦正式开馆。

1995年7月,为深化改革,国家体委决定将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与中国体育博物馆两个机构予以合并,更名为“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博物馆)”。

从1993年起,中国体育博物馆开始尝试在南戴河建立第一个分馆,后因故关闭。2004年与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联合组建了“中国体育博物馆·南通分馆”;2005年,在组织史学界、考古界专家学者进行论证、国际足联确认山东临淄为世界足球发源地的基础上,与淄博市人民政府联

合建立了中国体育博物馆·淄博分馆（临淄足球博物馆）；2006年与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局合作共建了中国体育博物馆·杭州分馆。这三个分馆至今运转良好。

（二）收藏文物，夯实博物馆基础

中国体育博物馆始终把收藏文物作为博物馆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收藏工作出现的新变化，1994年起草了《进一步清理我国运动员参加国际比赛所获得的奖品、礼品、纪念品的通知》，并纳入了国家体委立法工作计划。1995年，国家体委正式下发了第一个关于体育文物工作的法规——《近现代体育文物征集管理办法》。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国家体育总局从2005年开始给博物馆拨付文物征集专项经费，并逐年增加。经过有计划的调研，并通过行政、法规与市场相结合的特色手段，中国体育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工作有了长足进步，藏品的数量和质量逐步提高，总量超过6000多件（套）。其中，有国家1~3级文物100多件套。这些藏品独具体育特色和文物价值。

1. 古代体育收藏弥足珍贵。中国体育博物馆复原了远至新石器时代的石镞、石斧、石戈和鱼钩等与体育活动有关的物品；收藏着商代的青铜戈，西周时期的青铜矛头，春秋晚期的青铜戈，战国的青铜剑，汉代的车骑狩猎画像石、铜弩机、舞乐杂技纹铜镜，唐代的黑陶和彩陶武士俑、绞胎陶球、三彩马戏陶俑、围棋子、舞蹈陶俑，宋代的牙雕“蹴鞠”笔筒、蹴鞠纹铜镜，辽金的童戏纹铜镜，魏晋时期彩绘骑射狩猎画像砖、宋代打马球砖雕，明清时期的五彩婴戏高足瓷碗、蹴鞠纹象牙雕牌饰、素三彩武术纹将军罐盖、五彩童嬉瓷片、滑冰鞋（双铁条式、双刀片式、单刀片式）、象牙象棋等。在征集收藏文物的同时，博物馆购买和复制了多种古代体育图书和绘画，如《史记·苏秦列传》、《战国策·齐策一》有关齐国民间蹴鞠的记载、陶弘景著《养生延命录》、唐·薛胜的《拔河赋》、《水游全传》插图·摔跤、《三才图会·八段锦》、司马光《投壶新格》等。另外，复原了西汉墓出土的《导引图》，临摹了《清明上河图》、《明皇击鞠图》、《仕女捶丸图》、《冰嬉图》等，再现了古代体育活动的主要项目和场景。

2. 近现代体育收藏不乏精品。在中国体育博物馆近现代藏品中，包括1913年第一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陈彦获得的跳远金牌，它是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规模较大的国际性比赛并在比赛中获得的第一枚金牌；1928年第9届荷兰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手册（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在册）；中国田径运动员周愚余参加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所用证件；1936年为纪念中国参加奥运会而烧制的瓷盘；1936年足球运动员贾幼良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纪念章、纪念牌；1948年第14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团员签名片；民国时期国内运动竞赛的各种纪念章、奖章、会徽；上海精武体育会获得第二届国术运动会团体锦标；1925年由中国第一个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编印出版的《体育通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颁布的《各种赤色体育规则》、《体育游戏教材》和陈毅同志在指挥新四军作战之余用过的围棋等。它们是近现代中国体育的

历史见证。

3. 当代体育收藏意义非凡。1952年第十五届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游泳秩序册（中国运动员吴传玉参会在册），记忆着新中国第一次的奥运之行；1957年国际泳联颁发给戚烈云打破男子蛙泳100米世界纪录的证书；中国第一个女子世界冠军（1961年第26届世乒赛女子单打冠军）邱钟惠的运动服；1966年陈家全在柬埔寨金边新兴力量运动会获得的男子100米金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张燮林在20世纪60年代使用的被誉为“魔术师”的球拍，即中国第一块“长胶”球拍；1975年5月27日中国登山队再次登上珠穆朗玛峰，在峰顶采集的珠峰岩石标本；1985年国际奥委会授予中国奥委会的“奥林匹克杯”；中国第一个奥运会冠军——许海峰比赛用的观察镜；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运会火炬。还有国家体委（国家体育总局）领导移交的国际体育交往礼品。如1994年，国际奥委会赠送给伍绍祖等同志的瑞士斯沃琪（swatch）公司专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100周年制造的奥林匹克纪念钟，南非奥委会赠送给何振梁的申办2004年奥运会纪念物——囚禁过曼德拉先生的罗本岛上的石灰石等都颇具特色。还有2001年，国际奥委会委员于再清参加选举第29届奥运会主办城市会议时穿过的制服；北京奥运会结束后，组委会赠送给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缶”等一系列有历史意义和纪念价值的奥运物品。

4. 体育档案是博物馆的重要文献藏品。档案馆收藏着自民国到1985年以前的全部体育档案，包括中国与远东体育协会、国际奥委会最早的联系函件以及新中国参加和组织历次体育活动与比赛的文献，约10万多卷。2009年，档案馆接收了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档案约14万余件，极大地丰富了馆藏。体育档案馆的档案先后为《毛泽东传》、《周恩来传》、《邓小平传》、《贺龙传》、《陈锡联传》、《王猛传》、《体育之子——荣高棠》、何振梁的《五环之路》、《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等史书的编写，《中国与前苏联东欧体育交往的研究及其影响》、《中国奥林匹克源头析证》等课题的研究，以及《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等大型展览脚本撰写提供了宝贵的档案支持。为实现档案管理的现代化，国家体育总局近年来每年下拨专项经费，用于对馆藏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目前，馆藏档案已初步实现了数字化管理。

（三）举办展览，传播中国体育的核心价值

中国体育博物馆建馆20年来，平均每年推出2~3个重点展览，开展各种形式的展示活动，使悠久的中国体育文化为促进现代的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些展览主要包括：

1. 固定陈列，系统翔实。1990年举办的《中国体育展览》既是亚运会体育展览又是中国体育博物馆开馆的固定陈列。该展览按历史顺序展现了从远古到现代中国人民创造的绚丽多彩的体育文化和辉煌的体育成就。在中国古代体育部分，特别介绍了古代武术、射箭、角抵、蹴鞠、马球、捶丸、围棋、气功养生等活动，反映了中国古代体育集健身养生、娱乐教育和军事训练等各种社会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活动的特征；中国近代体育部分介绍了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近代体育发展演变的情况；新中国体育部分，

从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场馆设施科研等方面，反映了新中国体育事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奥林匹克部分，以生动的历史画面，展现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现代奥林匹克历史以及我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所取得的优异成绩；民族体育部分，展示了具有中华民族鲜明民族特色、多姿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1992年，《中国体育展览》在北京市举办的首届“文物节”的展览中，被评为“优秀展览奖”。

2. 专题展览，丰富多彩。中国体育博物馆围绕体育事业的中心工作，适时推出各种主题的短期展览，加强体育文化的宣传。如在第11届亚运会期间举办的《弘扬北京亚运会精神展览》及巡回展览。1998年，中国体育博物馆参加《辉煌的五年——十四大以来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成就展》，并获“最佳设计制作奖”。在北京两次申奥过程中，中国体育博物馆成为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对北京奥运会人文环境的考察点之一。体育博物馆在本馆推出的《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展》、《奥林匹克运动百年展》，在中华世纪坛和中山公园举行的《中国体育成就展》、《北京科技奥运图片展》等，紧密配合北京奥运会申办工作。博物馆还举办各种主题性展览，如为纪念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国家体委第一任主任贺龙元帅诞辰100周年举办的《贺龙与体育》展；纪念毛泽东同志“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题词发表50周年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中国体育成就展》；纪念中国乒乓球队建队50周年展现中国乒坛光辉成就举办的《银球耀五星——中国乒乓球队建队五十周年展览》，以及2005和2008年在第四十八和四十九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中国举办期间举行的《乒乓与中国》展览。2003年，为纪念中国女排在第九届世界杯女排赛场上夺回了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而举办了《奋力拼搏，勇攀高峰——弘扬“女排精神”展览》。北京奥运申办成功后，中国体育博物馆积极宣传“人文奥运”的理念，先后举办的《百年奥运 中华圆梦》、《中国体育美术精品展览》是北京奥林匹克文化节的重要活动之一。2005至2008年为配合北京奥运会的筹办推出的《奥林匹克与中国》大型巡回展览，足迹遍及北京、成都、广州、南京、上海、西藏、新疆、香港、海口、哈尔滨、青岛等中国境内的主要城市，充分展示了奥林匹克与中国体育互动发展的历史画卷，大规模地宣传普及了奥林匹克知识和中国体育精神。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中国体育博物馆参与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奥运会文化展览和北京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将北京奥运文化活动推向高潮。

3. 走出国门，影响世界。1999年，国际奥委会文化与教育委员会联合法国巴黎亚洲集美博物馆和中国体育博物馆在洛桑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了《中国体育5000年——艺术与传统》展览。中国体育博物馆征集了80多件古代体育珍品参展，全面展示了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创造的多彩的体育文化和绚丽的艺术传统，为外国观众开启了一扇了解中国体育文化的窗口。2006年德国世界杯期间，中国体育博物馆应邀参加《球类游戏——足球历史》展览。中国参展的10件古代蹴鞠文物，展现了来自世界足球发源地——中国的丰厚的足球文化底蕴。2008年，在北京

筹办奥运会期间，瑞士洛桑的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举办了《Beijing北京2008》展览，中国体育博物馆为其无偿提供的6件古代文物精品，是外国观众了解中国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为该展览增加了观赏亮点，并与北京奥运会文化活动交相辉映。

（四）宣传体育文化，以体育精神教育青年

中国体育博物馆是中国体育文化历史的见证和缩影，具有鲜明的历史回溯性。中国体育博物馆除了举办展览，主要通过以下方式发挥其教育功能：

1. 为广大运动员与观众提供一个联系和交流的场所。博物馆经常邀请一些著名的运动员做嘉宾，直接和观众见面，增加了展览的真实感和亲切感。比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50年体育成就展》期间，著名运动员王军霞、许海峰、王义夫等都纷纷来参与讲解，加强了运动员与观众之间的联系。中国体育博物馆还不失时机地向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体育文化教育。比如：1994年在庆祝奥林匹克运动百年之际，博物馆组织了系列活动，其中之一是请参加过奥运会的老运动员讲解参加奥运会的经历和为国争光的感受，激发了青少年的爱国热情，使他们深受鼓舞。

2. 编撰多种体育文化普及和教育以及各类出版物。在体育博物馆编撰的众多体育文化教育出版物中，图画本《中国体育明星名录》和《奥林匹克运动挂图》最具特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挂图，从奥林匹克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申办奥运会三个主题，展现了公元前776年~公元393年在希腊奥林匹亚持续了1000多年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和从1894年国际奥委会建立至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10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在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部分，展示了中国人民对以促进和平与友谊为宗旨的奥林匹克运动的一贯支持和参与。

3. 弘扬体育精神，传承中华文化。体育博物馆充分利用各种形式弘扬体育精神，传承中华文化。同时通过互联网及时发布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书刊快讯等信息，加强博物馆与社会各界的交流与沟通。鉴于体育博物馆在弘扬中国体育文化和传播奥林匹克精神、进行社会教育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1992年5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命名中国体育博物馆为“北京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97年6月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国家体委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2年4月又被授予第二批“中央国家机关思想教育基地”。

开馆以来，中国体育博物馆已接待了100多位国际奥委会委员、20多位国际单项体育协会主席等中外宾客100多万人次。

（五）开展中外体育博物馆交流，推动中国体育文化走向世界

中国体育博物馆走出去，在国际文化领域开展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参与国内外一些文博组织的活动进行的。

1. 加入国际体育遗产协会（International Heritage Association）。国际体育遗产协会前身是1971年建立的国际体育博物馆和名人堂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ports Museums and Hall of Fame），2006年改为现名。现有会员130个，主要来自美国、加拿大、中国、比利时、

瑞士、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各类体育博物馆。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并就博物馆的收藏、展览、研究、教育等专业问题进行广泛的交流。中国体育博物馆1995年入会，并参加了历年年会。中国体育博物馆的代表曾作过《中国古代体育传统》、《中国的奥林匹克运动》和《中国传统体育项目礼射的现代体育文化价值》的学术报告。

2. 参与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学术活动。1946年建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 简称国际博协(ICOM),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非政府组织, 有会员1万多个, 30多个专业委员会, 每3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 各委员会每年组织学术活动。1997年, 中国体育博物馆加入国际博协, 并参加了当年在澳大利亚举办的全体会议。以后每年参加2~3次各个专业委员会会议, 内容包括文物保护、收藏和修复、管理、展览、教育、博物馆学、博物馆数字化、安全、讲解培训等博物馆业务工作的方方面面。中国体育博物馆参与国际博协学术活动, 不仅了解了国际博物馆发展的新趋势,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世界博物馆的交流, 使体育博物馆的运作更符合博物馆的工作规律。

3. 成为奥林匹克博物馆协作会的成员。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协作会(International group of Olympic museums), 是在1985~1999年国际奥委会召开4次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馆长会议的基础上, 在国际奥委会终身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号召下, 于2006年在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建立起来的。目前拥有包括中国体育博物馆在内的会员11个, 每年召开一次会员会议(Olympic Museums Network Conference), 讨论和制定文物收藏、文化教育、网络宣传、博物馆商店经营等共同的计划, 强调国际间的合作, 并分成不同的工作小组互相合作、实施。

4. 在国际奥委会集邮收藏协会中发挥作用。1986年成立的中国体育集邮协会是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和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三个组织和国际奥委会奥林匹克集邮钱币纪念品收藏委员会的会员。1985年至今参加了国际奥林匹克集邮联合会举办的6次世界奥林匹克邮展和收藏博览会。2000年19部邮集全部获奖, 同时首次获得大镀金和镀金奖; 2004年取得了5金5银的成绩, 其中有1部大镀金奖和4部镀金奖; 2007年6月在北京成功地承办了第十三届世界奥林匹克收藏博览会, 并获得由罗格和萨马兰奇签发的优秀组织奖。2008年8月, 参加“北京2008年奥林匹克博览会(体育邮展)”, 三部邮集荣获金奖, 并获得镀金奖15个、银奖23个和铜奖9个。

四、体育文化天地阔, 书写汗青用丹心

体育文化工作并不是一项轰轰烈烈的工作, 而更多的是默默无闻、安贫乐道、扎扎实实、细致认真的辛勤劳动。数十年来, 正是由于有了许许多多为体育文化工作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埋头苦干、不懈努力的一代代体育文化工作者, 才成就了体育文化工作今天的繁荣和累累硕果。他们的工作令人敬佩, 他们的成果受用无穷。

体育文化工作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国家体委和后来的国

家体育总局领导关心、支持和重视体育文化工作分不开的。如: 贺龙同志十分重视对体育发展经验的总结; 李梦华同志对成立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编写《当代中国体育》、举办各种体育展览、建设中国体育博物馆等都给予了高度重视, 并多次参加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举办的活动; 伍绍祖同志多年亲自分管体育文史委的工作, 非常关心中国体育博物馆的建设, 对《体育文史》杂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的编辑出版以及体育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多次做过批示, 并亲自参加体育史学会的学术研讨会活动; 李志坚同志担任总局党组书记期间和退休之后, 一直关心体育博物馆的建设和《体育文化导刊》杂志的发展, 并从多方面给予热情的支持。刘鹏同志十分关心中国体育博物馆新馆建设, 多次作出指示和批示, 要求将中国体育博物馆新馆建设好。此外, 荣高棠、黄中、陈先、路金栋、徐才、何振梁、张彩珍、徐寅生、刘吉、张发强等许多老同志都曾给予体育文化工作许多宝贵热情的支持。他们的直接领导、热情关怀和支持是体育文化工作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

在新世纪,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国际间的竞争包括文化竞争日益激烈。体育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当今世界, 体育竞争已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竞赛(运动成绩是个人行为, 常常被不断刷新), 对中国人来说, 也不是一种简单的“与国际接轨”。中华民族固有的丰富而独特的优秀体育文化已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体育竞争已经成为一种体育价值观的竞争、一种体育文化发展模式竞争, 一种体育文化发展体系的竞争……简而言之, 是体育文化的竞争。为什么奥林匹克运动能够产生如此之大、如此之久的影响? 不仅是奥运会, 也不仅是奥运会上运动员创造的成绩, 而是它所体现和追求的理想。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表现形式, 是奥林匹克理念的载体。真正对世界产生影响的是它们背后奥林匹克运动一百年来所追求的理想、主义和信念, 即奥林匹克运动的文化价值观, 也就是奥林匹克的体育文化。

什么是体育文化? 如何发展体育文化? 如何认识体育对于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等是一个系列课题, 也是应当引起体育界高度重视的战略发展大课题。NBA来了, 英超来了, 它们不仅是作为球队来的, 更是作为一种竞技体育文化发展模式来的。中国的篮球怎么办? 中国的足球怎么办? 当然, 这里不仅是指在国际规则下中国人怎样打篮球, 怎样踢足球, 而是如何认识作为一种文化存在方式的篮球和足球。

当前, 我们正以科学发展观统筹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要“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新目标。而全面发展体育事业, 既要重视运动成绩的进步, 更要重视体育文化建设, 因为体育文化建设关系到体育事业发展的未来, 是体育发展的战略性任务, 也是参与国际体育竞争的重要保证。

经过多年的发展, 体育文化工作已从简单搜集、整理体育史料、总结历史经验的“向后看”模式演进为通过结合现实、研究历史、发现规律、探索发展新路的“顾后瞻前”模式。从重视体育文史工作的演进为重视体育文化工作是在对体育的社会文化价值深刻理解和认识基础上

的历史性进步。

2006年1月18日,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正式批复国家体育总局,同意“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中国体育博物馆)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中国体育博物馆)”。同年2月,国家体育总局下发《关于国家体育总局文史工作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通知》(体人字[2006]119号)。《通知》说,“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协调全国各省(区、市)体育文化工作,弘扬体育文化主旋律,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服务”,并规定了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的10项主要职责。

新时期体育文化工作将以可传承的优秀体育文化价值观为认识、传播、弘扬的目标,并致力于其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积极的影响。

在未来体育事业发展中,体育文化工作努力遵照:

-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涵和指导思想;
- 以“更快、更高、更强”与天人合一、快乐健身、和谐融合相统一为体育文化发展理念;
- 以打造一支高素质、高效率、高效益、高水平的体育文化建设队伍为基础;
- 以建立一个适应体育文化发展,包括体育产业发展为特色的机制和运作方式的手段;
- 以美术、文学、艺术、影视、展览、收藏、研究、宣传以及国际体育文化交流等为丰富内容;
- 以继承和创造中国特色的体育文化为目标,为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不断进步做出贡献。

(本文来自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主任)

(上接第17页)

引导、协调和监督社团的行为,为社团融入现存社会的经济政治秩序提供基础条件。从而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在公民的结社自由和国家对社团的监管之间,建立起某种平衡,创造出一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

(三)宽松社团登记,拓展社团活动空间是我国体育社团改革的基本方向

社团的合法性是独立的社团得以存立、发展的基本前提,更是规制其外部关系的法律基础。任何社团在具备现实存在合理性的前提下,立足于政府利用法律手段全面强化规制的背景,都必须全面满足法律的要求。因此,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在社团的设立方面采取部分登记的准则主义立场和放任主义姿态,这是理顺国家和社会关系、转变国家职能的理性选择。具体要求政府在社团管理中应放宽对社团成立的登记控制,依法对社团活动进行管理,积极制定落实社团税收减免的规定,以促进社团的数量增加,保障社团作用的发挥。

(四)强化社团自律,实现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和社团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调控格局,是体育社团管理的重要内容

适度管制是世界各国针对社团管理通行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在社团自治的领域内,法律的功能在于从外部提供社会性导引以促成社团内部的自我管制,而不是一味强调

司法介入社团内部的治理。综观发达国家体育社团管理的特点和经验,我们不难发现,面对因结社自由而产生的大量的民间体育社团,国家不仅要自上而下加强对社团的管理,更应重视通过建立民间社团自律机制实现社团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面对我国体育社团数量众多、登记机关资金、人员有限的情况,可以考虑强化业务主管单位在社会团体管理方面的职能,利用业务主管单位对社团的熟悉,发挥业务主管单位的管理优势。同时,还应重视对社团的社会监督,明确社会对社团的管理监督权限和监督方式,如定期准确公布自身情况,接受公民、新闻媒体的监督。最终实现从政府监控的一元化监督管理转向政府管理、社会监督和民间组织自律相结合的多元调控格局。

参考文献:

- [1] 卢元镇.论中国体育社团[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1996(1):1~7.
- [2] 雷兴虎,陈虹.社会团体的法律规制研究[J].法商研究,2002(2):47~56.
- [3] 贾西津.中国公民社会的理论与实践[C]//吴玉章,主编.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04~105.
- [4] 齐红.结社自由与非法人社团制度[J].环球法律评论,2004(秋):295~303.
- [5] 信春鹰,张辉.全球化结社革命与社团立法[J].法学研究,1998(3):110~120.